

※ 陳子展研究專輯 ※

陳子展先生的桑榆歲月

陳允吉* 口述 方曉燕** 整理

一九七六年十月，粉碎「四人幫」標誌著「文革」結束，陳子展先生的生活與境遇隨之悄然地發生了變化，一切都從「文革」的動盪中逐漸趨向正常。特別是一九七九年以後，對於歷次運動中的冤假錯案的重新審查的工作，做得非常徹底，陳子展先生被錯劃為右派一案得到了徹底平反，一切誣枉不實之辭悉皆推翻。陳先生原先是二級教授的職稱，「反右」之後降了兩級，變成四級教授，這個時候恢復了他二級教授的職稱，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工資待遇。與此同時，一直與陳先生生活在一起的次子陳志申，原來因為受他的問題牽累，長期沒有工作，至此亦落實政策，在虹口的一個學校裏安排了工作。並且，系裏確定陳先生招收一名先秦文學的碩士研究生，這也是子展先生生平所招的唯一的研究生。

陳先生的一生大起大落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一開始是戴了一頂「紅帽子」，「反右」的時候給他戴了一頂「白帽子」，一生中間備歷驚濤駭浪，亦曾陷入困頓寂寞，至此終於趨向於安定。

從這時起，先生家「門庭冷落」的情況也有了變化，不斷有人來長樂路居所看望陳先生，在諸多來訪者中，首先要說到廖沫沙。廖沫沙是先生在湖南省立一師及上海南國藝術學院任教時的學生，一九六六年以前正處在北京市領導崗位上，因《三家村劄記》一案，在「文革」初期遭到猛烈的衝擊；他平反後到上海第一站，就去看望先生。陳先生也非常高興地接待他。另須一提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錢伯城先生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他因《國風選譯》、《雅頌選譯》兩書的組稿和出版事宜，曾到陳先生當時所住的虹口大陸新村寓所造訪，兩人「對許多學術問題幾乎全

* 陳允吉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** 方曉燕，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。

有相同的語言」，談得十分投契。一九五七年，錢伯城先生同陳先生一樣被錯劃為右派。一九七九年，他平反後，也到先生長樂路寓居探望。另外，就是當時新任復旦校領導的夏征農，曾兩次到先生家拜訪。夏征農在上世紀三十年代，是先生主編《讀書生活》雜誌時的同事；陳先生是主編，夏先生是編輯助理，彼此非常熟悉，因此到復旦後，他就去看陳先生，噓寒問暖，詢問先生有什麼要求。先生說，除了希望集中心力從事研究外，別無其他要求。別的領導去看望他，他也是這樣回答的。

七十年代末，香港媒體的記者蕭沓到先生家中採訪，不久他寫的一篇採訪記在香港報紙上發表，裏面寫道，陳先生在湖南長沙縣立師範讀書時，是易白沙的學生，易白沙是「五四」前後中國第一個提出打倒「孔家店」的人，性格非常激烈，後來因為感到很多問題想不通，無法解決，就投湘江自沉了。採訪記裏說，先生之性格與易白沙有共同的地方，先生的諸多筆名中，他自己最喜歡的是「楚狂」一名；又說他講話聲音很大，放聲大笑時，「聲震屋瓦」。以往，曹聚仁也曾說過類似的話：「陳子展也是一個狂人，聲如洪鐘，笑如裂帛。」總之，先生對蕭沓寫的這篇採訪記非常滿意，覺得寫出了他的風貌和性格特徵。

一九八一年，先生住址從長樂路遷至校內第七宿舍，即現在的第七宿舍八十四號二〇一室。復旦的幾個宿舍，過去都有舊稱，譬如第一宿舍叫「廬山村」，因為復旦抗戰初期曾經在廬山歇腳；對面的第二宿舍，叫「徐匯村」，因為復旦公學曾從吳淞遷到徐匯的李鴻章祠堂；第六宿舍叫「淞莊」，因為復旦公學最早在吳淞；第七宿舍叫「渝莊」，因為復旦曾經在重慶。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搬出學校前，曾住過第七宿舍（舊稱渝莊）和第一宿舍（舊稱廬山村），為此，先生把他這次遷居稱作「重返渝莊」，從中可見先生心情之愉悅。新居的住房面積稍有擴大，環境他也滿意，因為在第七宿舍最南端，較為安靜，打開南窗，有時還可聽到復旦附小孩子的琅琅讀書聲。先生還喜歡外出散步，復旦周邊路上人行道較寬，散步條件也較好。但陳先生身體微胖，腳力不濟，又喜歡獨自出門散步，沒有人陪伴，不久就出事情了。這一年的初冬，先生在五角場散步，不慎摔傷。系裏打電話通知我快去那兒，我趕到五角場時，先生已被當地居民移入室內，在躺椅上休息。中文系楊竟人、于東元等青年教師先我到達，經商量立刻叫救護車，將他送往長海醫院急診部；經拍片確定為股骨骨折，隨即轉入病房，等待手術。手術成功後，他在醫院住至深冬還家，從此，先生不到戶外散步了，僅在家中稍事活動。

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前期，先生全力投入《詩經直解》、《楚辭直解》兩書的研究撰寫，其《〈楚辭直解〉凡例》云：「愚治《詩》五寫，研《騷》亦已三寫。十多年來，或作或輟，直至今茲，甫告寫畢。」一九七六年後，他在學術上進入了全面的收穫時期。先生從事科研所秉承的宗旨是《論語·里仁》中的兩句話，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子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」他在幾十年中，將這一宗旨付諸實踐，他對學術事業有著發自內心的眷戀，為追求真知而不辭辛勞地工作，其治學體現出很高的境界。先生所撰有關《楚辭》的解題，除了〈遠遊解題〉「文革」前在山東大學《文史哲》上發過，其餘如〈離騷解題〉、〈九歌解題〉、〈天問解題〉、〈九章解題〉等，基本上都是在「重返渝莊」前在《復旦學報》、《學術月刊》、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等刊物上悉數發表，一時間引起了學界同行的高度關注。《詩經直解》一書，一九八三年十月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；《楚辭直解》，一九八八年二月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而一九八二年時，他的舊著《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》由上海書店重新影印。舊著《國風選譯》、《雅頌選譯》，一九八七年由臺灣仰哲出版社重刊。其他尚有一部《詩三百解題》共八十八萬七千餘字，則遲至先生身後的二〇〇一年十月，甫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。

一九八四年春節，我去第七宿舍向先生拜年，恰值《詩經直解》新書送到不久，凡送友人學生的新書，先生都用毛筆題簽，還刻上齊白石為他所治的兩枚印章。他將贈我的上下冊，鄭重地送給我，談話時說起昨晚迎新年爆竹聲勢之盛，是他以前所從未聽到的，他說話時的口氣，顯得非常平靜和寬慰。陳先生的治學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，他主張「博觀約取」；閱讀和接觸的東西要廣，但一生致力鑽研的範圍不宜太廣。陳先生自己認為，在兩本《直解》出來以前，自己的學術都是「博觀」而已，除了少數幾篇論文寫得還可以外，其他的成果，他自己並不怎麼看重。但這兩部書的出版，卻是他學術大廈的封頂之作，應該說，他自己是比較滿意的。朱東潤先生本來對陳先生不太瞭解，但自從《詩經直解》出版後，就對陳先生的學術成就做了很高的評價。

先生「重返渝莊」後，生活上也有了變化，與他同住的次子陳志申調到了復旦圖書館工作，並且與鄒兆曼女士結了婚，顯得更有家庭氣氛。洎乎他久已盼望志申圓滿成婚，故對這個新的家庭結構，倍加愛護；而媳婦鄒兆曼女士知書達理、尊敬長輩，也獲得先生的信任和關懷。他經常往來的友人，除了原來的范祥雍、杜月村

外，又有了賈植芳、蔡尚思等先生。范、杜兩位先生對陳先生完成兩本《直解》，助益頗多，陳先生自己家藏書不多，書稿的校閱，主要靠兩位先生幫忙。所以陳先生後來在新書封面上署名時，將他們校閱者的名字和先生撰述者的名字並列放在一起，藉此凸顯兩位先生所做出的貢獻。對於蔡尚思先生，陳先生一直評價很高，曾同我說起蔡先生讀書很多，看問題很尖銳。另外，還有鮑正鵠先生，他也是陳先生的學生，在重慶時，曾與他一起改作文，陳先生向他強調改作文要注意兩點——墨要磨得濃，圈要畫得圓。此外，王運熙先生以及吳中傑、李慶甲、顏應伯、葉易等中青年教師，也經常去陳先生家小坐。復旦校友過滬，也多有造訪。另外，他的文章和書刊登出版後，外地高校屢有師生就一些相關的問題向他請教，碰到這種情況，陳先生一定每信必覆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馮玉祥將軍的長公子從海外到上海，特地驅車至復旦七舍看望子展先生。因抗戰時期，馮玉祥拜楊伯峻為師，而楊伯峻是子展先生在湖南的一個學生，故馮玉祥特地投呈大紅帖子，帖上工楷端書稱先生為「子展太老夫子」，自稱「小學生馮玉祥」，到先生寓所恭行再傳弟子禮。此後事過境遷，這張謁帖不慎遺失了。馮氏長公子後來知道了這件事，所以到滬造訪先生，是按原來尺寸大小，為先生補送了一張馮玉祥將軍當年的謁帖。

這段時期，陳先生個人的生活亦得到更好的照顧。原來開設在國權路上的來喜飯店，是抗戰勝利後跟著復旦從重慶遷來上海的，川菜甚為可口，如周谷城、趙景深等很多老先生到學校上課，中午都喜歡去那裏用餐。後來飯店的老闆娘因為飯店不做了，就到陳先生家去幫傭燒菜，為此，宿舍社區裏的熟人都說陳先生老來有福。不久，先生家裏換了一位從浙江餘姚來的保姆，做事勤快、熱情肯幹、全心全意、責任心強，可以說是為陳先生的健康盡心盡力。保姆覺得陳先生很和善，陳先生對她也非常滿意，很願意幫助她，家裏的成員都叫她「媽媽」。有次，陳先生收到一筆稿費，隨即分成若干份，親屬和小輩各一份，保姆也分一份。陳先生一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，但是從上述這些事情說來，大家都覺得陳先生晚年真有福分。

先生晚年、尤其是去世前幾年，有較多時間住在華東醫院，或在醫院，或在家中，輪流居住，因在醫院中可以碰到巴金等老友，他心情也較為舒暢。加諸保姆能跟著他一起去醫院服侍，可謂照顧得無微不至，晚間保姆就在走廊臨時搭鋪休息。此期間，我曾經兩次去華東醫院看陳先生，覺得他很適應那裏的生活，心態亦很平靜。我手頭有的一本上海書店影印的《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》，就是先生在醫院裏

送給我的。

一九八七年秋冬，王運熙先生告訴我明年是陳先生的九十華誕，希望我出面張羅，給先生慶祝一下。當時我正在主持中文系的行政工作，覺得以慶祝先生執教若干周年的名義開個會沒問題的。此前，郭紹虞先生一九八三年在鉅鹿路作協禮堂開過；吳文祺、張世祿先生一九八六年在南京西路聯誼俱樂部開過。一九八六年為朱東潤先生開的會，是與上海市作協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辦的，在作協禮堂開，亦很順當。至一九八八年初春，王先生又同我談起此事，我就約了王運熙、杜月村、葉易一共四人去華東醫院與先生面商。我們下午兩點半左右到達，陳先生午睡已醒，被子蓋得嚴嚴實實，只露出一個頭。我坐在床邊同他說話，他聽我說到慶壽的事，他輕輕地搖一搖頭，說不要辦了。我再勸他，他就表示堅決不接受，到最後看我還要講下去，他就說：「這算什麼，我坐在當中，大家對著我這個老人說你怎麼好怎麼好，我欣然接受，這個不是很無恥嗎！人家自己願意無恥，我沒有意見，但是我不願意無恥。」話講到這個份上，此事只能作罷了。我作為子展先生的受業弟子，就想送一副對聯給先生，希望把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研究以及先生的治學風格體現進去。我草擬了一個初稿，經王運熙先生的岳父杜蘭亭先生修改，最後確定下來是：「盛業名山傳楚些，衡門泌水仰陳風。」陳先生一生著重研究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，《詩經》有〈陳風〉，陳先生又姓陳，〈衡門〉、〈泌水〉都是〈陳風〉裏的作品，適可用來象徵先生敏悟深思、不求聞達的人生境界。後來就請樓鑒明書寫完畢，送給陳先生。他看到了很高興，說他也很喜歡作對聯，過去為熊十力作過一聯：「北斗以南獨此老，光黃之間多異人。」熊十力對這副對聯非常讚賞。

到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，我同中文系辦公室的于東元先生，還約了古典文學教研室的兩位同事，帶了一盒雙層蛋糕、一匹唐三彩馬、一件木雕工藝品、一束鮮花，代表中文系，包括我個人，向陳先生祝賀。剛好鮑正鵠先生也在，陳先生挺高興的，還要留我們吃飯，我們坐了一會兒就告辭了。

一九九〇年春，先生病情惡化，身上要插很多針頭輸液，心情很煩躁，要拔斷輸液管。四月八日傍晚，先生家保姆打電話告知系裏陳先生逝世，我同林之豐老師兩個人乘學校的小車，火速趕往華東醫院，抵達時還不到六點，家屬都還沒有到，保姆在走廊迎候，把我們帶進病房。陳先生安詳地躺在病床上，看來好像還在思考什麼問題，形貌幾乎沒有任何變化。我和林之豐老師在床前肅立，向先生遺體三鞠躬。家屬中志申到達最早，不久志純、志強及其他親屬也到了，齊向先生鞠躬致

哀。志申梳理先生頭髮，用毛巾幫他擦臉，還久久親吻先生的臉頰。志申取出先生的遺囑，交給志純、志強閱讀，他們表示沒有異議。而後親族一起商量後事，我和林之豐老師即告辭回校。

陳先生的遺囑為一九七八年先生八十歲時所立，除就若干家事向兒女做具體交代外，又嘗簡述先生自己的生平「生於湖南省長沙縣靖港格塘邱家塘陳家老屋之一、八檯子埭上一戶農家」，「時在光緒廿四年戊戌三月廿四日」，西曆為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四日，「父字德慎，母姓熊氏」。關於他身後之事如何處理，先生說了三點：一、「不必訃告親友」，二、「不必開追悼會」，三、骨灰「願拋向疇昔想蹈未蹈的東海」。所以，後來就沒有發訃告，沒有開追悼會，殯殮事宜均由家屬自行操辦。逝世之周年，次子志申及兒媳鄒兆曼女士攜帶先生的骨灰，撒入普陀山附近的海中。華中一校長認為，像陳子展這樣一位在復旦服務了六十年的老先生逝世，他有責任把這個消息告訴全校師生，這與陳先生的遺囑沒有什麼衝突。後來華校長在我寫就的初稿基礎上，刪繁從簡，便以「通知」的名義發布在學校的校布告欄上。

翌年四月，陳子展先生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召開，這個會開得再樸素沒有了，沒有布置會場，也沒有花什麼錢，來的都是跟陳子展先生接觸比較多、很敬重先生的一些人。我問志申來不來，他也婉拒了。我們開了一天，雖然過程簡單，但是對陳先生學術成就的闡述討論，還是比較充分的。